

蠡測日本外交戰略調整的意圖與發展 ——「離岸平衡者」策略的省思

助理教授 胡敏遠

提 要

- 一、日本作為美國的代理人，以制衡區域強權(中共)，一直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安全政策的核心。
- 二、攻勢現實主義認為霸權國家對於區域中新崛起的強權，會利用「離岸平衡者」的方式以應之。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制約條件下，大國別無選擇只能透過均勢的建立，抗衡對手。
- 三、日本調整外交戰略的考量因素：(一)日本在朝鮮安全問題上日漸邊緣化；(二)美國課徵關稅政策的教訓，對日本帶來的省思；(三)中、日經濟合作帶來的利益等。
- 四、亞太的權力均勢(美、中兩強)幾乎已然形成，美國必須仔細算計並處理好其與代理人(日本)的關係與角色，否則美國推展「離岸平衡者」策略，只會為美國帶來更多的負面因素。

關鍵字：日本、美／日聯盟、離岸平衡者、中日友好條約、印太戰略

前 言

二戰結束以來，日本一直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為堅實與信賴的盟友，美國也將日本視為在亞太區域美國利益的代理人。美／日聯盟甚至被美國視為安定亞太地區的重要支柱。相對的，日本的政治目標是利用《美日安保條約》為槓桿，積極拓展日本在亞太國際事務上的揮灑空間。美、日之間在「魚幫水、水幫魚」的導引下，日本不僅以美國馬首是瞻，對美國的依賴程度也愈益加深。

然而，自川普就任總統以來其在全球各

地區採取一連串有利於美國的戰略舉措，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貿易大戰，讓日本深感不安。尤其，2018年6月川普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會晤(以下簡稱「川金會」)後，白宮片面宣布將暫時終止美／韓之間的軍演，更讓日本對於長期依賴美國的安全保障，頓失信心。安倍政府的外交戰略可能從扮演美國在亞洲再平衡的急先鋒角色，尋求在美、中之間新平衡的戰略發展。

本文從國際關係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理論的「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s)」觀點¹，探討日本戰略角色調整的

考量因素。主因，攻勢現實主義認為霸權國家對於區域中新崛起的強權，會利用「離岸平衡者」的方式應付崛起的新強權。²學者墨爾斯海墨(John Mearsheimer)認為，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制約條件下，大國別無選擇只能透過均勢的建立以抗衡對手。制衡對手的責任則交由區域的大國來承擔，將可避免直接面對的威脅與風險。³日本作為美國(超級強權)的代理人，以制衡區域強權(中共)，一直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政策。美／日同盟更是實現上述目標的基礎。但是，川普因過分維護美國利益，讓日本深感不安進而考量調整外交戰略。本文研究聚焦於日本戰略調整的因素分析，並從變項因素檢視「離岸平衡者」的理則。據此，蠡測日本未來外交戰略的發展。

美／日聯盟對日本國家利益的影響與日本國際角色的演變

一、日本的政治目標與安全威脅

本世紀以來，日本認為其與周邊國家發生大規模戰爭的機率雖然降低，但國際安全環境的變化可能會對國家安全帶來威脅。主

要的安全威脅源包括北韓的核武威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鄰國的領土(海)紛爭，以及高風險性的非傳統安全。⁴因此日本對於國家戰略目標的設定，除了圍繞其與美國同盟關係的重要性外，更加強調中共、俄羅斯與北韓對其國家安全的威脅與挑戰。從2017年年底日本公布的防衛白皮書，如何在區域中免除威脅，為日本當前對國家安全所重視的事務。白皮書指出：

「中國大陸海軍向南方、遠海不斷擴張活動範圍，日本首度在東海中部海域發現大陸「遼寧」號航空母艦，確認大陸航母已進入太平洋，今後在日本海的活動也可能日漸頻繁。中共海軍在接近釣魚台(日稱尖閣諸島)的海域慣例性活動。中共軍機在沖繩等西南列嶼的空域活動頻仍，自衛隊將進行部隊的重新整編，加強西南地區的防衛態勢。」⁵

顯而易見，日本國家的安全策略是堅持美日聯盟安全體系，以鞏固雙方的安全合作關係。對日本而言，「北韓核武」與「中共崛起」為兩項影響日本國家安全的威脅源。在國家安全的考量下，日本格外重視美日之間的合作關係。⁶日本長期以來其國家戰略的

1 攻勢現實主義的代表學者包括John Mearsheimer, Eric J. Labs, Fareed Zakaria, Randall L. Schweller等，其中以John Mearsheimer最具代表性，他的文章不僅眾多且在理論上有較完整的系統。本文在理論的使用上，將以John Mearsheimer為主，其他作者論述則參考之。

2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236-237.

3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210.

4 劉宗和，《日本政治發展與對外政策》，頁365。

5 《日本防衛白皮書》，2017年11月，<http://www.cna.com.tw/search/hysearchws.aspx?q=%E6%97%A5%E6%9C%AC%E9%98%B2%E8%A1%9B%E7%99%BD%E7%9A%AE%E6%9B%B8>，檢索日期2018年7月7。

6 李明峻，〈美日同盟關係走向牽動東亞區域安全〉，《青年日報》，98年12月24日 第7版。

發展目標為：建立自主的外交領域以確保國際政治的穩定和營造對日本有利的周邊安全環境，穩定內政以建立安全牢固的內部安全環境，同時要建設國防自主的軍事力量以及重新釐訂自衛隊的新任務。

二、日本在美／日聯盟中的角色

冷戰結束後，日本政治領導人慢慢意識到中國的軍事擴張和北韓的核武與導彈威脅，已成為其安全的主要挑戰。所以，日本國內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支持日本政府發展更大的軍事能力。⁷歐巴馬政府時期，安倍為提升日本軍力，扮演美軍“亞太戰略再平衡”的旗手。藉美／日再同盟的重建，確立了兩國之間在各個領域的深化合作。川普自入主白宮後，美國希望日本能提高軍費支出，分攤美國在日本的駐軍費用，以共同對抗兩者的共同威脅（暗指中共）。在美國的允諾下，日本在美／日同盟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承擔更多的責任。意味著川普將給予日本更多的空間對抗中共。實際上，美／日安保體系連結了兩國對於維護區域和平穩定的戰略利益和政策方向。它不僅確保美國在亞太區域的軍事部署，同時也提供日本較過去更為積極的安全角色。再者，「美日安保條約」也保留了兩國在戰略運用上的彈性空

間。⁸

對日本而言，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證是其經濟發展的根基。安倍政府甚至認為「振興經濟方案」決定施政成敗，但需要時間逐步落實。尤其，日本須先鞏固「美日同盟」才能夠與中國周旋。相對的，日本也明瞭與中共發展互惠合作關係，才能為日本經濟振興方案注入新動能，也才能夠避免被美國冷落或拋棄。⁹如何在美、中之間取得平衡，始是為日本外交戰略的兩難。

三、日本在亞太地區的目標

安倍政府推展區域合作的手段，運用《美日安保條約》以強化美日聯盟關係，作為提高日本國際地位的方法。2012年底，安倍政府以復興日本的經濟榮景與民族精神作為號召，企圖重新登上亞洲經濟強權，進而恢復昔日大和民族的光榮歷史。曾為安倍內閣的重要安保顧問北岡伸一指出，日本應該重新解釋憲法，容許自衛隊擴大集體自衛權的適用範圍。安倍也公開敦促國會，希望透過改變釋憲內容，促成日本自衛隊可行使集體自衛權。¹⁰為加速日本國民對恢復集體自衛權的支持，甚至開放對外輸出武器，以提升日本在國際上的影響力。¹¹

安倍深知欲達成修憲目的必須利用民

7 〈日本的軍事復興與美日同盟的未來〉，《美國之音》，2017年2月21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trump-japan-20170220/3733187.html>，檢索日期2018年6月20日。

8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地區安全〉，《政治科學書》，1998年6月，<http://club.ntu.edu.tw/~yang/paper-11.htm>，檢索日期2018年6月20日。

9 曾復生，〈日本新國安戰略和中親美〉，《旺報》，2018年3月9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309000203-260310>，檢索日期2018年6月19日。

10 〈安倍擬修憲「右傾化」惹議〉，《青年日報》，民國103年1月14日，版5。

11 陳一新，〈日本國安動作頻仍 升高周邊緊張情勢〉，《國家政策基金會》，2014年1月14日，<http://www.npf.org.tw/post/1/12904>，檢索日期2018年7月2日。

族主義為手段，才能激起國人對其政策的支持，最佳方式就是激起國內民族意識，以凝聚國人對修憲的共識。值得注意的是，冷戰末期美國在亞太地區不僅充當了日本外交決策的主導者，更在聯合國的各項會議中操控日本的投票權。¹²但隨著冷戰結束及日本經濟的發展快速，日本漸漸的覺得其在外交領域上，不一定要完全遵照美國方式與他國交往。¹³尤其，日本海外經濟不斷擴展的狀況下，也想在全世界的經濟網絡中，發展其政治影響力，成為世界級的強權國家。為實踐日本民族主義的復興，安倍內閣每年都不斷增加國防預算。為了讓自衛隊能具有更多的海外國際合作的空間，2015年修訂了防衛大綱，同時重新檢討過去實際上被否定行使的集體安全權。為了面臨緊迫的對應，日本防衛省加強南西諸島防禦，提高軍備投資。

東京政府力爭在亞太地區成為與其經濟相適應的政治大國，進而能與歐美等國共同主宰國際上的重要事務。本世紀以來日本首先積極佈局的是與東協(ASEAN，東南亞國

家合作組織)發展合作關係。¹⁴日本看重東協國家的重要性與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前景，與這些國家改善關係，並非臨時決定的重大決策。早在1977年前首相福田赳夫時期，即曾宣布：「日本要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文化領域與東協國家建立特殊的友誼關係。」日本的東南亞政策也被稱為「福田主義」；綜合考慮了日本過去作為經濟大國面臨的抗議，以及未來面對中國的崛起的挑戰等因素。日本根據這一原則大幅擴大了對東南亞國家的政府開發援助(ODA)和投資。¹⁵東京政府採取的手段是以擴大經濟交往的範圍，從經濟範圍再擴溢到外交及政治的空間。¹⁶日本積極參與東協組織的各項活動，同時也推動多邊安全對話與交流，利用各種雙邊與多邊合作框架擴大日本的影響力，以樹立在亞洲地區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作為爭取在未來戰略格局中的有利地位。

四、「川金會」後日本對美國與中共政治態度的變化

2018年6月12日「川金會」的最大亮點為

12 米爾頓·埃茲拉茲(Milton Ezrati)著，沈建譯，《變-日本變局將如何改變世界的均勢(Kawarj)》(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年1月)，頁192-193。

13 王贊，〈關於日本內政外交形勢〉《國際戰略研究》，2007年第2期，頁23-24。

14 晉林波，〈新世紀日本外交戰略的發展趨向〉《國際問題研究》，2004年第4期，頁34。

15 鄭佑相，〈日本為何36年來一直向東南亞示好〉，《東北亞研究中心(南韓)》，2014年1月26日，http://blog.sina.com.tw/url_verify.php?tit=%5B%E8%BD%89%E8%BC%89%5D+%5B%E8%A9%95%E8%AB%96%5D%E6%97%A5%E6%9C%AC%E7%82%BA%E4%BD%9536%E5%B9%B4%E4%BE%86%E4%B8%80%E7%9B%B4%E5%90%91%E6%9D%B1%E5%8D%97%E4%BA%9E%E7%A4%BA%E5%A5%BD&ref=http%3A%2F%2Fblog.sina.com.tw%2Fcnear%2Farticle.php%3Fpbgid%3D33723%26amp%3Bentryid%3D664535&url=http%3A%2F%2Fen.chosun.com%2Fbig5%2Fsite%2Fdata%2Fhtml_dir%2F2013%2F12%2F02%2F20131202000024.html，檢索日期2018年6月7日。

16 施曉恩、張毓欣，〈東協-日本總括性經濟協定之發展與評析〉，《經貿法訊》(政大商學院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第77期，2008年12月23日，頁4-8。

朝鮮應美方要求，逐步實現棄核的目標。川普為能獲得此不一定能獲得之利，而欲抵消美／日(或美／韓)失和的立即之害，是促使日本調整外交戰略的重要因素。「川金會」舉行之前，安倍首相急忙前往美國與川普會面，討論日本的安全問題。希望美國不要犧牲日本的安全利益。¹⁷然而，從「川金會」結果來看，有關日本的領土(空)安全，以及被朝鮮綁架的日本人質等問題，川普都沒有向金正恩提及。日本在「川金會」上似乎完全地隱形。之後，美國與北韓的單獨接觸也都沒有與日、韓先期討論，更讓日本在外交上持續被邊緣化，甚至可能動搖美日同盟的信任關係。¹⁸

世界著名期刊《經濟學人》針對「川金會」後亞太的國際局勢分析，文章認為金正恩允諾川普棄核之論，動搖了川普對日、韓同盟的重要性。川普覺得北韓棄核之舉，比起美／韓同盟或美／日同盟更具吸引人。因為川普可以證明自己可以保護美國人民。但此協議對日本及南韓有如惡夢，也證明美國

為了私利可以犧牲盟友，間接地影響了盟友對美國的信任。¹⁹國內學者廖小娟認為：「美國與北韓的和解會談持續順利進行，日本不但在外交上會持續被邊緣化，甚至可能動搖美日同盟的堅強信任關係。為此，日本將會需要區域內另一大國「中國大陸」的支持、至少能夠維持友善；也就是日本接下來應該會更重視改善與中國大陸關係，一來可以與中國大陸聯手，如恢復六方會談，確保日本能夠在一系列北韓核武談判中不被犧牲，二來則可避免美國仍然只有模糊的印太戰略，甚至因與北韓和解而有意逐步退出東北亞時，不用單獨面對壯大且有敵意的中國大陸。」²⁰

川普上任以來，其聲譽正逐漸崩毀，川普的信譽間接的削弱華府在盟邦國家的外交影響力，美國的盟邦對美國的政治承諾，漸次地失去信心。²¹對此，5月9日，在日本東京進行日中韓三國元首會議，中、日關係獲得進一步的合作。²²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招待會上表示：「日中關係從競爭進入了協調時

17 〈安倍赴白宮會川普確保日本安全〉，《經濟日報》，2018年6月7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511/3185243>，檢索日期2018年8月20日。

18 廖小娟，〈陸委會專題研究-「川金會」及中日韓關係觀察〉，《大陸與兩岸關係簡報》，2018年6月12日，<https://ws.mac.gov.tw/Download.ashx?u...n=MjAxODA2MDUucGRm>，檢索日期2018年8月17日。

19 天下雜誌轉載，〈解讀川金會-《經濟學人》：一場金正恩註定不會輸的高峰會〉，《天下雜誌》，2018年6月11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0441>，檢索日期2018年8月17日。

20 廖小娟，〈陸委會專題研究-「川金會」及中日韓關係觀察〉。

21 Yarhi-Milo Keren, "After Credibilit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Trump Er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8, Vol. 97, Iss. 1, pp. 75-76.

22 徐宏馨，〈日中韓三國首腦會議後的日中關係走向之分析〉，《Yahoo論壇》，2018年5月31日，<https://tw.news.yahoo.com/%E3%80%90yahoo%E8%AB%96%E5%A3%87%E5%BC%8F%E5%BE%90%E6%B5%A4%E9%A6%A8%E3%80%91%E6%97%A5%E4%B8%AD%E9%9F%93%E4%B8%89%E5%9C%8B%E9%A6%96%E8%85%A6%E6%9C%83%E8%AD%B0%E5%BE%8C%E7%9A%84%E6%97%A5%E4%B8%AD-084318012.html>，檢索日期2018年8月17日。

代。希望具體推進民間企業在亞洲的基建開發。願推動日中關係進入新的階段。」²³日本積極表態與中國大陸友好，雙方關係可望改善，最好的例子就是為迎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40周年，安倍將於今年下半年訪問中國大陸，習近平則可望在明年6月訪問日本。

24

國內研究日本的學者何思慎教授認為：「當前美、日聯手推動「印太戰略」，抑制中國對亞太區域政經秩序影響力的意圖昭然若揭，但不可將之簡單化為冷戰再現。在全球化浪潮下，各國與中國經濟關係千絲萬縷，難以完全封鎖中國，美、日、澳的軍事合作目標是抑制中國謀求用力量改變迄今為止的國際秩序的意圖，並敦促中國發揮亞洲責任大國的角色。」²⁵因此，日本盱衡國際局勢，在外交上學習亞太地區多數國家所採

取的「避險策略」²⁶(經濟戰略與中共密切合作，安全戰略與美國緊密結合)，可能是安倍政府較為有利的戰略選擇。

概述攻勢現實主義的「離岸平衡者」理則

「離岸平衡者」的理則出自於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攻勢現實主義理論。攻勢現實主義又以墨爾斯海墨的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作為其中的代表著。²⁷墨爾斯海墨認為其思想主要來自霍布斯(Hobbs)及一些古典現實主義學者的政治權力觀、同時他參考新現實主義的華爾志(Kenneth Waltz)的國際權力結構論述。²⁸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制約條件下，大國別無選擇只能透過均勢的建立以抗衡對手。制衡對手的責任則交由區域的大國來承擔，將可避

23 〈日媒：中日關係「融冰」進程開始提示〉，《壹讀》，2018年5月11日，<https://read01.com/zh-tw/Q3dAk4A.html#.W3oNP84zapo>，檢索日期2018年8月20日。

24 〈中日敲定互訪安倍秋後先行〉，《中時電子報》，2018年5月5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505000270-260203>，檢索日期2018年8月20日。

25 何思慎，〈川普亞洲行後的美日關係及東亞局勢〉，《國家政策基金研究會》，2017年11月24日，<https://www.npf.org.tw/3/17754>，檢索日期2018年8月20日。

26 亞太地區的中小國家中，主張「雙邊下注(hedging)策略」者，認為美國既然無法改變中國，也不可能限制中國，但又需面對一個與美國存在競爭關係的中國崛起，認為美國除了與中國打交道，在可以合作就合作，該競爭的地方就競爭外，更需強化美國與其亞洲盟邦的關係，以備一旦中國崛起後無意融入美國所主導的區域秩序，美國在亞太的位置依然有所憑依，同時也可以強化美國對中國政策的強度與彈性。See, Dan, Blumenthal and Aaron Friedberg, "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Asia," AEI online, January 12 (2009).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s/pubID.29144,filter.foreign/pub_detail.asp.

27 攻勢現實主義代表性學者蠡包括John Mearsheimer, Eric J. Labs, Fareed Zakaria, Randall L. Schweller等，其中以John Mearsheimer最具代表，而且他的理論與著述較為完整，一般研究攻勢現實主義的學者都會以其為代表，本文研究也不例外，至於其他作者的觀點，作為從旁補充之用。

28 約翰·米爾斯海墨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世紀出版社，2003年4月)，譯者序，頁14。

免直接面對的威脅與風險。²⁹「離岸平衡者」策略是霸權國因應次一級霸權國時慣用的策略，其背後的邏輯是較現實主義更為積極的權力觀與政治操作，說明如下。

一、「攻勢現實主義」的權力與道德觀

古典現實主義的權力觀是從人性「惡」的面向，看待國際社會與秩序的發展。在國際社會中由於國家處在恐懼與不安的狀況下，維護最大的權力，可防止被他國侵略，也可維護住自己的安全。如同古典現實主義學者愛德華·卡爾(Edward Carr)在其《歐洲20年危機》一書中寫道：「權力是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政府意味著權力的國際化。國際政府就是提供行使權力國家所支配的政府。」³⁰攻勢現實主義強調行為者(大國)的意圖與能力之間的關係。傳統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提供了對於「權力」與「道德」在國際政治中所能發揮的效用；國家藉由權力的運作，在其間產生出外交政策、國際協議、國際爭端的處理態度等。傳統現實主義將國家追求權力視為國際社會成員欲追求的目的，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甚至提出權力等於利益，權力更是等於國家

目的。³¹結構現實主義學者華爾志雖不完全認同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觀，但仍認為權力在國際體系中所能發揮出的力量。他認為國家最終目的是要藉權力而獲得安全，權力僅是實現安全目的的一種手段。華爾志的權力觀認為，在體系中大小排列形成結構，權力的變化引起結構的變化，權力在國家間權力的分配及分配的變化有助於結構的形成和對結構的變化。³²有關權力的界說以及其與道德之間的發展關係，無論傳統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都不願意將國家間的政治問題與國內政治問題相互混淆。³³因此，傳統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間對於權力的界定和利益的互動關係具有其獨立性格，而不應與國內政治互為一談。³⁴

攻勢現實主義特別強調霍布斯主義的特性；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墨爾斯海墨認為國際體系中的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安全的稀缺性。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會相互害怕、擔憂危險，外患和戰爭爆發的可能性隨時都在增加。國家之間的害怕愈厲害，權力的鬥爭就會愈激烈。³⁵國家為了獲取安全而展開的激烈競爭迫使國家採取進攻性的策略，結果

29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210.

30 Edward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 Harper & Row, 1964), p. 106.

31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 8.

32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23-128.

33 詹姆斯·多爾蒂等著，閻學通等譯，*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頁67-69。

34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Press, 1985), chapt1.

35 米爾斯海墨認為國際間雖然存在著國家間的組織，也存在許多溝通管道，但國家永遠無法知道對方的真正意圖，相互之間常有算計，無法信任對方。See,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42-43.

常導致衝突和戰爭。他指出「國家最初的動機是防禦性的，但國際體系的結構，迫使國家去作進攻性的思考，有時則會採取進攻性的行動。」³⁶攻勢現實主義還引用「天助自助」之詞，來強調自體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二、攻勢現實主義的假設與重要觀點

墨爾斯海墨的「攻勢去現實主義」是繼承上述現實與新現實主義的觀點，進而將結構現實主義區分為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³⁷其基本的假設有以下五點：第一，國際體系為無政府狀態(Anarchy)；第二，大國具備用於侵略的強大軍事力量；第三，任何國家均永遠無法掌握他國之意圖(Intention)；第四，生存仍為大國的首要目標；第五，大國仍為理性行為者，會依成本與效益的算計能力進行分析與評估。³⁸基於以上五點假設，攻勢現實主義的重要論述應孕而生。

(一)國際政治即是大國政治

攻勢現實主義對國際社會所持的是悲觀態度，他們認為大國處在無政府的國際秩序中，恐懼(fear)支配國家的行為。國與國之間

終究不存在任何的信任，安全威脅是大國之間導致衝突的根本原因。³⁹大國之間的衝突常會引發國際社會的動亂，因為當大國認識到相對力量正變得強大時，就會傾向於向外擴展政治利益，以求先發制人，實現自我。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即是「大國政治」。⁴⁰大國最終理想是要成為世界唯一或地區霸權，唯有成為霸權之後，國家才會滿足現況。國際社會不存在現狀滿足的國家，國家只有不斷的尋求各種方法與手段增加權力，讓自己處於有利地位。⁴¹因此，任何大國會抓住任何機會成為體系中的霸主，以確保在該地區內無平行的挑戰者。

(二)權力分配決定大國政治的意圖

攻勢現實主義的體系結構概念與結構現實主義的概念有些相似。結構現實主義認為不同的國際權力分配型態產生不同的國際結構，大國間的權力分配往往決定國際體系內結構力量的分布。⁴²墨爾斯海墨認為國家最初的動機是防禦性的，但國際體系的結構會迫使國家去作進攻性思考，有時則是採取進攻

36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3, winter 1994/1995, pp. 5-49. (47-49)

37 Joseph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Europe, America, 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38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12-14. 洪鎌德，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新論（臺北：楊智出版社，2011年5月），頁147。

39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5.

40 米爾斯海墨攻勢現實主義會特別強調通過權衡擴張行為的得失大小，以決定自己該採取何種行為，而國家的首要目標是要不斷獲取權力，才能改變現有的權力結構。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5

41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32-36.

42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80.

性的行動。⁴³因為結構雖是由大國的力量分配而形成，但力量的分配則由大國的意圖來決定。⁴⁴攻勢現實主義預測國家對權力均勢非常敏感，國家會尋找機會來增加自身實力，或削弱對方力量，國家更常會利用權力重新分配的機遇時期，產生其對外的外交政策。⁴⁵攻勢現實主義的權力意圖要比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運作顯得更為積極。

(三)大國政治為「修正主義」國家間的衝突過程

墨爾斯海墨在其《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中，運用了18個國家的歷史，並以個案分析方式論述大國在追求權力的過程都是採取修正主義的角色。⁴⁶大國無法判定他國是否對其懷有敵意或者是否一定會對其進攻，為了自己的安全與生存大國必須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而且必須具備一定的進攻的能力，才能使國家保有能生存的策略。⁴⁷墨爾斯海墨也

不贊成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追求權力僅是為了獲得安全，而認為追求無限的權力，才是國家最終的目標。一旦地區大國掌握住絕對的權力，就會建立起依此強權為中心的國際秩序，而對那些不服從強權建立起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強權的主要目標就是要設法遏制其挑戰的意圖。⁴⁸

(四)大國採取「離岸平衡者」的策略與功能

墨爾斯海墨以19世紀的美國在歐洲與亞洲為維持其霸權為例，他認為霸權國自然是維持現狀的國家，美國採取的手段為「隔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的策略。⁴⁹墨爾斯海墨認為一個大國可以征服它從陸地上能到達的相鄰地區，但是絕對不可能獲得全球霸權。大國為了能在許多地區都成為霸權者，「離岸平衡者」的角色扮演遂成為作為霸權國的最佳策略選擇。⁵⁰他認為美國在東北亞

43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May 1994), p.32-35.

44 在米爾斯海墨看來，華爾茲(Kenneth Waltz)的結構現實主義則過分保守因為國際政治幾乎沒有維持現狀的國家，因為國際體系即以犧牲對手以獲得權力，當重要機會出現時大國就會抓住機會，而大國最終之目標就是成為體系中的霸權。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1.

45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329.

46 John Mearsheimer以日本(1868-1945)、義大利(1861-1943)、德國(1862-1945)、蘇聯(1917-1991)、威廉德國(1890-1914)、納粹德國(1933-1941)、美國的核政策、蘇聯的核政策、美國的崛起(1800-1900)、美國與歐洲(1900-1990)、美國與東北亞(1900-1990)、英國大戰略(1792-1990)、法國(1789-1815)、俾斯麥的普魯士(1862-1870)、冷戰(1945-1990)、近代歐洲的大國戰爭(1792-1990)等18個戰爭。說明大國在追求權力的過程都是修正主義國家。See, John Mearshes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chap 6,7,8,9.

47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32.

48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9.

49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chap 7.

遭遇到潛在威脅的挑戰時，會傾向於將責任推給其他大國處理，而不是自己親自對抗這些威脅。大多數的大國都一樣會選擇推卸責而不是均勢策略。⁵¹因為，霸權國家要維持在地區的優勢必須得先防範地區其他霸權的出現，而最佳的辦法就是在當地扶植另一國家，使之成為「責任承擔者」，自己則充當「離岸平衡者」。

(五)大國的政治意圖在遏止另一個區域強權

依據傳統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理論，強權國家所要追求的目標就是在國際體系中能夠永續經營其王國事業。所以極大化追求權力與國家安全正是追求其霸權地位的必要之道。⁵²質言之，強國追求霸權事業的永續經營，等同於追求權力的極大化，也等同於追求軍事實力的極大化。因為在多極體系的國際社會中，弱勢強權經常會感到不安全感，亟需改變當前不利現狀，而採取各種結盟、建軍，與發展武器裝備等手段。相對的區域

霸權在面對其他強權深具敵意的行動時，亦會感到害。因此，會尋求軍事力量或與其他國家合作以遏制弱勢強權可能帶來的挑戰。⁵³所以，墨爾斯海墨認為每個國家最主要的目標就是最大化地擁有權力，以遏制區域另一個強權的出現。⁵⁴

日本戰略調整的因素及其對「離岸平衡者」理論的挑戰

一、日本戰略調整的因素分析

(一)日本在朝鮮安全問題上日漸邊緣化

「川金會」原本是為緩解朝、美長期軍事對峙的緊張，卻讓日本失去了在朝鮮半島問題的發言權，也讓美／日同盟關係的重要性下降。⁵⁵尤其在「川金會」之後，川普在未告知日、韓的狀況下，逕自宣布終止美韓聯合軍演。此舉對日、韓兩國都帶來不小震驚。⁵⁶讓日本產生最大的危機是，擔心反覆不定的川普可能也會拋棄日本，讓美日同盟關係生變。若朝鮮半島局勢日漸緩和，將牽動

50 米爾斯海墨認為平衡者在未獲得絕對優勢前，他的作為是強勢及具有進攻性質，例如20世紀前的美國是擴張性的、革命性的，之後的是和平性的，因為美國已完成西部的開發，成為具有兩洋的大國。他甚至大膽判斷，美國在21世紀將會減少在歐洲和東亞地區的駐軍，試圖將上述地區交給其他大國（美國的盟邦）去抵抗區域內的威脅。一旦這種作為失效，美國將會使用軍事力量去消除威脅。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140, pp.236-238.

51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66.

52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1-34.

53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42卷第2期，1993年3、4月，頁9。

54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

55 廖小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56 蔡增家，〈美中貿易後《雙海》成為新戰場〉，《Yahoo論壇》，2018年6月22日，<https://www.xuehua.tw/2018/06/22/%E3%80%90yahoo%E8%AB%96%E5%A3%87%E5%BC%8F%E8%94%A1%E5%A2%9E%5%AE%B6%E3%80%91%E7%BE%8E%E4%B8%AD%E8%B2%BF%E6%98%93%E6%88%B0%E5%BE%8C-%E3%80%8C%E9%9B%99%E6%B5%B7%E3%80%8D%E6%88%90%E6%96%B0%E6%88%B0/>，索引日期2018年6月30日。

美日中三邊關係的扭力變化，日本因而必須做出相應的戰略調整。⁵⁷易言之，美國在朝鮮半島安全問題上，不與日本事前溝通且採取的單邊決定的舉措，都讓安倍不斷思考長期倚賴美國的利弊因素。

(二)美國課徵關稅政策的教訓，對日本帶來的省思

川普政府為營造「美國第一」的理想，已在全球各個地區實施貿易戰，其中又以中、美之間相互提高關稅，讓全球經濟蒙上陰影。事實上，日本對美國課徵關稅的經驗，可謂刻骨銘心。1960年代，日本經濟快速發展，至1970年已成為全球的主要出口國之一。當時美國是世界最大的進口國，由於美國對日本連續多年承受巨額貿易赤字，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升級。1970～90年代，美、日兩國在「紡織品、鋼鐵、汽車、半導體、電信」等諸多領域產生貿易紛爭，其中，1995年「美、日汽車貿易戰」更是雙方貿易談判的焦點。同年5月美國宣布對日本13款汽車及其零組件的關稅由2.5%提高至100。最終日本選擇讓步，也拉開了日本「失落的20年」大幕。⁵⁸日本對於美國展開貿易戰的歷史記憶，認為美國為了自身利益往

往會犧牲他國利益。尤其，美國的作法並不會顧及是否為其盟友，此點更讓日本感到心寒。

在區域的經貿整合上，日本過往對美國採取一面倒的政策，歐巴馬總統期間美國主導的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日本更是美國的死忠支持者。雖然川普宣布退出TPP後，日本取而代之成為CPTT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的主導者，安倍政府仍不放棄邀請美國重新加入CPTTP，以延續美日經濟合作，藉此圍堵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戰略。但是對於川普對亞洲國家(包括日、韓)大打貿易戰，日本深恐美國的保護主義，將嚴重衝擊日本的經濟發展。⁵⁹因此，如何在美、中之間採取平衡策略，才不會在經濟發展上過於依賴美國而錯失在亞太地區發展的良機。

(三)中、日經濟合作可帶來的利益

當今的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上，已經有其國際位階；在政治方面因受其經濟快速增長之利，及財富實力激增扶持之下，其在國際政治舞台的發展，越走越穩。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已然進入「新常態」，製造業已醒悟到要從價值鏈的低下端，向中高端升級、再升級，並適時進行產業模式的深度轉型。⁶⁰日

57 〈社論：吳釗燮籲台日安保對話，如消逝風中〉，《聯合報》，2018年7月7日，版A2。

58 1990年代以來，日本對美貿易順差直線上升，其中汽車貿易順差佔比高達60%（主要原因為Toyota、Honda等廠商席捲美國市場），日本對美大量出口汽車成為兩國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為緩解貿易赤字，1995年美、日開啟汽車貿易談判，美方要求日方開放汽車市場，在三年內從美國增加90億美元的汽車零組件進口。詳見，〈中美貿易戰開打 延燒全球汽車產業〉，《車訊網》，2018年5月9日，<http://www.carnews.com/article/info/5e7a06d7-50cf-11e8-8ee2-42010af00004/>，索引日期2018年6月19日。

59 〈社論：吳釗燮籲台日安保對話，如消逝風中〉，《聯合報》。

本企圖聯合美國之力對抗中共，漸次地感覺力不從心，對美國的信任感也逐漸的消退。權衡之計的考量，日本考慮選擇與中共的合作，較利於國家當前的發展。

綜言之，朝鮮半島情勢的驟變及美國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及保守主義的作風，正轉變日本以往對美國的信賴。2018年初，安倍原本意圖結合美國、澳洲與印度，形成區域安全的合作聯盟(印太戰略)，期盼深化與澳洲、印度，以及東協國家的經濟合作關係，並配合川普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布局，拉攏菲律賓、越南，以擴展日本的影響力。但是，多數印太地區國家並不願完全配合日本，反而是在中共與美國之間採取平衡策略，都讓安倍深感挫折。⁶¹亞太地區的權力結構已然形成，中、美權力競爭的格局，迫使各國大多採取「避險」策略，而非完全押注在某一方。日本政府在外在大環境的壓力下，其國際戰略也不得不作出調整。

二、日本調整對外政策對「離岸平衡者」理論的挑戰

(一)代理人的動機與立場問題

美國國際關係學者雷尼(Christopher Layne)在其《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來的美國大戰略》(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一書中提出美國運用「離岸平衡者」的假設條件。他認為唯有美國在歐、亞大陸的戰略利益受到危害時，美國才會介入、阻止區域霸權的出現。若不會威脅到美國的利益，美國應該不會介入大國之間的紛爭。⁶²美國當前在亞太地區對其霸權的最大挑戰，莫過於中共日益增長的國力，及其無法顧及盟國利益的狀況發生時，最為嚴重。值得注意的是，當美國的霸權角色受到質疑，或美國無法再提供足夠的公共財給其他盟邦國家時，「離岸平衡者」的策略也會跟著發生質的變化。

美國雖對中共祭出貿易制裁，中、美貿易大戰似乎有方興未艾之勢，但從亞太區域的發展趨勢來看，多數國家採取「避險」策略可提供中共一個可望成為區域霸權的機會。因為在經貿領域上，會有愈來愈多的國家願意與中共站在同一陣營。此一形勢的變化，改變了日本對美國過依賴的作法。例如2018年6月在東京舉行的RCEP部長級會議，日本一改過去的冷淡，力促各國在今年內達成最終協議。由於RCEP是中國大陸所主導，日本態度的轉變，可視為中日關係將從對抗逐漸轉為合作的前兆。⁶³

川普為了經貿利益採取保護主義的經濟

60 聶建中，〈《中國製造2025》啟動大國崛起的引擎〉，《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7年8月9日，<https://www.npf.org.tw/2/17252?County=%25E6%25BE%258E%25E6%25B9%2596%25E7%25B8%25A3&site=>，索引日期2018年7月3日。

61 〈日本新國安戰略和中親美〉，《旺報》，2018年3月9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309000203-260310>，索引日期2018年7月4日。

62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60.

63 〈社論：吳釗燮籲台日安保對話，如消逝風中〉，《聯合報》。

政策，意圖重啟與日、韓等國的自由貿易談判，很容易讓長久以來的美／韓、美／日的同盟關係產生變化。川普的經濟策略勢必弱化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安全承諾。美國的盟邦及友邦國家會不斷透過提高自主性，來追求自己國家的安全、繁榮及福祉。⁶⁴尤為甚者，美國的亞太盟友會以其結盟作為與美國談判的籌碼，以求獲得在其他領域更多的利益。但是川普的作法似乎未依「霸權穩定論」的理則對待其盟邦國家。尤其針對霸權國如何維繫領導權的作法，川普的行為更是讓其盟邦感到不安。相對的，他卻不斷消費那些曾經願意付出其忠誠跟隨霸權國(美國)的追隨者(主要指日、韓)。川普所秉持的主張，是要冒險驅散美國的盟邦及夥伴國。美國在維護自身利益時，也會加速美國霸權地位的結束。

(二)代理人的風險考量

日本為承擔美日同盟的責任，因而獲得強化軍事力量的機會。由於北韓核武威脅日益加劇，日本國內也出現要求美國同意其發展核武能力的意見，以作為承擔戰爭風險的代價。日本是否該裝配核能力，可能引發中共的憤怒與反彈，中、日之間的衝突也必然升高。這些連鎖反應，恐非是美國操縱「離岸平衡者」所能控制的負面效益。尤其，日、中、韓之間的矛盾一旦激化，將讓美國

更難調處其與盟邦國家的關係。基此，美國只准許日本自衛隊強化傳統的軍備力量，對於日本擁核能力的管控，恐為美國所望見到的情形。相對的，日本與美國的對價關係若無法談攏，日本是否願意承擔北韓的核武威脅，都是安全戰略上的重大抉擇。

(三)代理人與修正主義國家關係調整的變數

墨爾斯海墨認為國際社會不存在現狀滿足的霸權國家，由於無法滿足現狀的欲望始終存在，即會促使國家不斷追求權力。⁶⁵他所指的不滿意現狀的霸權國家多為區域的霸權，因為在國際政治中除美國之外不存在超級的霸權國。超級霸權國與區域霸權有層級之分但無從屬的階級關係。修正主義國家會不斷利用各種機會擴張權力，但擴權的時機需謹慎評估，衡量成本效益，以及可能付出的風險代價。國家的擴權包括了增加財產、擴大軍力、獲取核武和降低其他的區域強國的國力。所以，國家擴張權力必須擔負可能出現的風險。⁶⁶因此，區域霸權欲挑戰全球超級霸權國的過程，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決策程序。一旦選擇錯誤，不僅錯失挑戰霸權的機會，甚至會讓國力急速下降。

美國學者格拉漢·艾里森(Graham T. Allison)在其新著《注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脫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64 Stewart M. Patrick, "Trump and World Order: The Return of Self-Help,"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7), pp.52-59.

65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35.

66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 4.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如艾里森所言，中共可能從「修正者國家」的地位，逐漸挑起可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大國關係，最終中共可能成為美國在東北亞區域的敵人。⁶⁷

日本作為美國代理人的目的，旨在牽制中共的崛起。美、日之間在「魚幫水、水幫魚」的導引下，日本不僅以美國馬首是瞻，對美國的依賴程度也愈益加深。然而，從2018年5月中、日、韓東亞領袖高峰會的結果分析，中、日之間因受川普關稅政策的影響，中日之間達成了數項合作協議及共同防範東海地區衝突和平解決機制的簽訂。因此，代理人與修正主義之間的關係並非絕對一層不變。兩者也有可能因外部環境改變，出現合作的可能。世界霸權國利用代理人的力量，牽制修正主義國家的通則，必然會遭到質疑與挑戰。

日本意圖調整外交戰略的未來發展(代結論)

近年來，日本格外重視同有著共同價值觀的同盟國、友好國展開三方合作，從而建構在亞太地區對抗中國的框架組織。當前除美日韓、美日澳、美日印等框架之外，東京

政府亦藉由日、澳、印度之間的持續磋商，確保日本與各國的合作關係朝向多層次、多領域的方向發展。⁶⁸然而，受朝鮮半島的情勢發生結構性的改變，致使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大國談判機制中，逐漸邊緣化。在區域的貿易形勢也正發生改變，日本若想依靠美國壯大自己的經濟實力可能無法滿足其預期的目標。上述因素讓日本須思考其外交戰略，並尋求中、日之間關係的改善。

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研究員詹姆斯·肖赫夫(James L Schoff)在其著作《尋求共同福祉的不尋常聯盟》，(Uncommon Alliance for the Common Good)，介紹冷戰後的美日同盟的發展。他認為中國未來的經濟和政治發展和演變，是美日同盟中最重要的變量。雖然，美、中和日、中關係中經濟依存越來越強烈，共同利益也在增長。但是，這兩組關係中存在零和競爭、互信缺乏以及世界觀衝突的因素，這不但阻礙了合作，並可能引發破壞性衝突。⁶⁹

美國以日本為代理人的「離岸平衡者」策略，將受到嚴峻的挑戰。墨爾斯海墨認為在一個以競爭為內核的世界中，國家都具有利用他國的強烈動機。⁷⁰然而，國與國之間的合作是否可能消除國家間的安全競爭。此

67 林楓，「繞不開的修昔底德陷阱，美中必有一戰？」，美國之音，2017年6月8日，<http://www.chinesejustice.com/content/article.php?did=1574&pid=136888&tpl=page&lang=sh>，檢索日期2018年7月10日。

68 何思慎，〈川普亞洲行後的美日關係及東亞情勢〉，《海峽評論》，第325期，2018年1月，<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9759.html>，檢索日期2018年6月28日。

69 轉引自，〈日本的軍事復興與美日同盟的未來〉，《美國之音》，2017年2月21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trump-japan-20170220/3733187.html>，檢索日期2018年6月20日。

70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53.

點，墨氏並未詳述。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均勢與推卸責任是國家用以保衛勢力均衡的方法，為反對入侵者的主要策略。推卸責任的次數與程度則取決於威脅的大小而定。⁷¹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假設；強權國的安全感必須在控制崛起強權後，安全才會獲得保障。然而，國際社會中不存在現狀滿足的國家，因為現狀永遠無法確定，實無法滿足於國家的需求，國家只有不斷的尋求各種方法與手段以增加權力，讓己方處於有利地位。⁷²其中的關鍵仍為代理人(日本)與霸權國(美國)之間不存在從屬的階級關係，各方都會不斷的增加權力，以謀取最大的國家利益。換言之，米爾斯海墨所認知世界唯一的霸權國家(美國)，仍需與區域大國存在一定的平等關係，而非主宰(控制)的關係。基此，「離岸平衡手」策略運用在東北亞地區須注意區域強權力量的分布狀態。亞太的權力均勢(美、中兩強)幾乎已然形成，美國必須仔細算計並處理好其與代理人(日本)的關係與角色，否則該策略的推展只會為美國帶來更多的負面效應。

目前日本正嘗試外交戰略的調整。雖然安倍政府仍會將新的「安保法制」置於日本國家對外戰略調整的首要位置，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日本對國際格局的理解和國家志向

的核心本質。⁷³因為一邊倒向美國，可能不利於其經濟的發展。本文認為，日本國家戰略會略作調整，力求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日本仍會以《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礎，藉由參與及擴大在亞太周邊國家的合作，以達到壯大自己的目標。但在經濟策略上，東京政府正強化與中共的經貿合作關係，思考必須與亞太地區大多數國家的立場一致；努力促成區域的經貿整合，才有利於日本未來的發展。

作者簡介

胡敏遠先生，陸軍官校72年班、戰院正規班87年班、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曾任營長、國防武官、戰院主任教官，現為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71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267-268.

72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34-36.

73 宋海濤，〈國際格局變動中之日本對外戰略定位 及其調整〉，《全球政治評論》，2017年5月，特集，file:///C:/Users/warc100005/Downloads/%E7%89%B95-02%E6%B2%88%E6%B5%B7%E6%BF%A4%20(4).pdf。